

2 0 世 纪 思 想 回 眸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自由的冒险历程

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

[法] 贝尔纳-亨利·雷威 / 著
BERNARD-HENRI LÉVY
曼玲 张放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自由的冒险历程

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

〔法〕 贝尔纳－亨利·雷威 著
曼 玲 译
张 放

中央编译出版社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自由的冒险历程

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

[法] 贝尔纳-亨利·雷威 / 著

BERNARD-HENRI LÉVY

曼玲 张放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1999-3198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本书中文版由法国 GRASSET & FASQUELLE 授予
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法)贝尔
纳·亨利·雷威著;曼玲,张放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0.5

ISBN 7-80109-379-8

I. 自…

II. ①亨… ②曼… ③张…

III. 知识分子-研究-法国-1900~1999

IV.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976 号

自由的冒险历程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发行部) 66117130(编辑部)

E m a i l: cctp_edit @ 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89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9.50 元

献给阿丽埃尔

译 序

应出版社要求,我们先粗读一遍《自由的冒险历程》。初步印象有二:一是很有意思,二是翻译不易。说它有意思,因为诚如作者在原序中表明的,该书写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经历,由此可概观法国知名文化人在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所扮演过的角色以及他们走过的曲折、复杂、甚至是痛苦的道路,他们给历史留下的痕迹和给后人留下的不解之谜,等等。无疑,这对认识和研究法国20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乃至政治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这对关心与研究当代法国、当代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人,尤其是对有志于了解20世纪法国文化名流、艺术家、作家的具体形象和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的研究者而言,是不可不读的作品。其次,本书写于90年代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这一系列震撼世界的事件不仅震撼了世界的政治家,也震撼了世界的文化人,尤其震撼了那些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的作家、艺术家。作者从哲学的角度讲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阐明他们在国内外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中的参与及表现,特别是他们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为实现各自为之奋斗的“主义”或目标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论战和斗争。不管你是否赞成作者的观点,这样的历史回眸,在此世纪之交,对认识本世纪,展望下一个世纪,尤其

是对认识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展望他们将来可能与应该走的道路,都一定会大有裨益的。第三,作者贝尔纳-亨利·雷威是法国新哲学派领袖人物,自70年代崛起,便成了法国媒体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论文连篇,专栏文章不断,写小说也写戏剧,拍电影也拍电视,甚至也主持电视专题节目,以其作品高产,尤其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身体力行,被认为是填补了萨特死后留下的空白。他思想活跃,观点鲜明,回顾历史,直面20世纪末的现实,虽是一家之言,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法国及西方的观点,更不乏发人深思,令我国读者感到振聋发聩之处。

说翻译《自由的冒险历程》不易,首先因为这是一长篇哲学论文。作者先写成四集电影(见附录),后又补写成书,两种形式共存互补。书中既有哲学家的思辨,也有散文随笔的抒情,既有历史学家的考证,也有小说家的想像发挥。其次,该书涉及到法国20世纪文化名流及古今内外哲人与思想家不下七八百人,囊括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第三,也是令译者更感难以处理的,便是书中大量引用作品和文章的篇名,更多的是脱离上下文的作品或讲话的片断。这对法国或欧洲的读者,特别是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读者,一般不会构成问题,但对于外国读者,特别是对不甚了解法国历史文化的一般读者而言,无疑会遇到不少理解上的困难。为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另外,我们认为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些介绍,也许对我国读者是不无裨益的。

贝尔纳-亨利·雷威1948年出生于犹太富豪家庭,中学时代便十分活跃,迷恋冒险猎奇,崇拜马尔罗,自认为属于马尔罗式的知识分子家族。1968年,进入于勒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从师雅克·德里达和路易·阿尔杜塞。“五月风暴”时期,参与“毛分子”活动,在于勒姆街的一家地窖里出席(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届会议,他是50余名代表之一。1971年,获哲学讲师学位。1971—1972年,响应马尔罗的号召,作为巴黎《战斗

日报》的战地记者参加孟加拉国的解放战争。1973年,在斯特拉斯堡讲授《认识论》,同时在于勒姆街高等师范学校教哲学。同年,发表他的开山论著《民族主义与革命在孟加拉》。同时,进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专家班子,直到1976年。其间,在格拉塞出版社主办一系列丛书,其中《伟人丛书》很快成为“新哲学”阵地。1974年,在《巴黎日报》负责“思潮”版面,同时还与《新观察》、《现代》杂志合作。1975年创办《意外》日报。此后,相继发表三部哲学论著:《人面兽行》(1977)、《上帝的遗嘱》(1979)、《法兰西思想》(1981)。这三部作品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奠定了贝尔纳-亨利·雷威“新哲学”领袖的地位。他的这些作品在知识界引起诸多非议,也使他成为媒体不可逾越的顶红人物之一。1979年,他跟随“无国界医生”去了柬埔寨。1980年,与人合作创立“国际反饥饿行动”。1981年开始在《晨报》发表每周随笔,同年8月,携发报机越境进入阿富汗,支援游击队反抗苏联侵略者。1983年,发表《原则问题》第一集。1984年,他的小说《头脑中的魔鬼》获梅迪西斯奖。1985年,发表《亚洲印象》。1986年,发表《原则问题》第二集,当年游历埃塞俄比亚,揭露西方食品援助的分配丑闻。1987年,发表《知识分子颂》。1988年,他的小说《夏尔·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获联盟奖。1990年,创办《游戏规则》杂志,发表《原则问题》第三集。1991年,发表《自由的冒险历程》,创作同名四集纪录片。1992年,为支持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他亲临萨拉热窝,创作《在萨拉热窝死亡中的一日》纪录片,在法国电视三台放映。同年,发表《原则问题》第四集以及他的第一部剧作《最后的审判》。1993年,与弗朗索瓦兹·吉露合著《男人与女人》。同年,在《观点》周刊发表每周随笔,同时为米兰的《晚邮报》、马德里的《世界报》和斯德哥尔摩的《快报》撰稿。1994年,同导演阿·费拉里合作,创作电影《波斯尼亚》,反映波斯尼亚人民的悲剧及其抵抗斗争。发表论著《危险的纯洁性》。1995年,发表《原则问题》第五集。1996年,发表《百合与灰烬》。1997年,编剧并导演电影《白天与黑夜》,发表《论

戏剧》。

《自由的冒险历程》电影与书放映与出版前后,各种媒体曾有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评介、报导、专访、辩论、专家评论、影评、书评等等,连篇累牍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不仅见诸于知名报刊,如《世界报》、《法兰西晚报》、《人道报》、《观点》、《快报》、《费加罗报》、《费加罗杂志》、《新观察家》等,也出现在一般认为与文史哲无关的日报、周刊和月刊上,如《星期日报》、《她》、《女人》、《生活》、《世界与生命》等等。其中不乏知名记者、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专评、访谈录。由此,足见《自由的冒险历程》在媒体引起的沸沸扬扬的场面和舆论的重视,这也说明《自由的冒险历程》回应了世纪末人们常有的心态,即对历史的回眸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所表现出的热心关注。诚然,作者讲述并阐释法国知识分子从上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直到今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左”的和“右”的积极介入过程中的状况与觉醒。这部作品给人的信息似乎是:20世纪是“重温自由含义的世纪”,“这个陶醉于思想意识的世纪现在正在我们眼前消逝”。作者在答《费加罗杂志》记者问中称:“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疯狂,一个世纪的动乱。”承认“他们的积极介入经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因为他们为了政治理想而无视真理,对他们眼中的理想国家犯下的罪恶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典型例子是德里约或布拉兹雅克之对于纳粹德国,罗兰或阿拉贡之对于苏联。他们都是赞成专制主义的见证。作者在回答《女人》杂志特约记者的问题时,称“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新曙光。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法国革命以一种新形式在继续俄国的革命;另一些人则着迷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苦行主义;而第三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至于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以及知识分子在世纪风云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德雷福斯事件产生的

知识分子概念指的是以左拉为代表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为卫护无辜,捍卫真理向当局作战。后来,被称之为“积极介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是为真理而战,而是为各自的政治理想而斗争,由此陷入歧途。90年代以后,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概念和作用又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的模式以萨特为代表,他自认为是某种活的传声筒,传达人民的或无产者的声音,抑或是大写的历史的声音。这种模式已一去不复返。当今的知识分子必须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即思考,回到对根本真理的思考,不再作任何人的传声筒,不再自认为是先知先觉的圣贤,并且将具体的历史当作思考的对象。这虽然不如先前那样引人注目,却是更加责无旁贷的。作者声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斗争是在民主与专制之间进行。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即这种斗争将在民主与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的狂热崇拜之间展开。

总之,《自由的冒险历程》在媒体反映中,更多的是赞许,也有不少的非议。法共《人道报》的一位作者以《被修正的历史》为题,基本否定了该书的价值,因为书中几乎未谈及阿拉贡在抵抗运动期间的作用。兼之,书中某些细节的失真或缺乏考证也授人以柄。

也许,兰斯大学的吉·斯卡佩塔(哲学与文学教授)的反应更为贴切,他说:“贝尔纳-亨利·雷威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哲学家,对我而言,这就是他的全部价值所在。他的地位吗?他在整个格局之外,是捣乱分子的地位,他不遵守游戏规则,无视规范行为方式,他是个挑衅者,反对空洞无物的哲学说教……雷威写的书每次都让我思考,我觉得他的书里充满了新思想,也就是巴特称之为的‘平庸的反语’……即便他的思想是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也仍然是作为‘现实效应’显现在全景之中,而这一点正是与我们要摆脱抽象及形式主义的愿望是协调一致的,他的言论往往‘与众不同’,同时产生爆炸效应……我尤其欣赏人们加给雷威身上的‘坏名声’,这正是震撼虚伪、打破成见、扰乱众口一词的某种标志。实际上,雷威作品中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反潮流的行为方式,有针对性的

挑衅,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就是他的这种胆大、迅捷和不计场合的风格。试想,当今法国哲学舞台上若是没有雷威,该是多么平淡而温吞啊?”

《自由的冒险历程》译稿完成于极端炎热的 1999 年盛夏,挥汗中更能感受译事的艰辛,而掩卷之时,我们也更意识到出版社决定在我国译介此书是很有意义的。其意义也许超过书本身。雷威在他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中竭力想弄清楚他们在世纪风云中为什么,又是怎样误入歧途的,并试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他的这种追求值得我们思考。相比之下,我国还没有如此详尽论述知识分子道路的作品。从本书不难看出,作者是一位没有框框的自由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大胆实践家,阐释中有个性分析,也有真知灼见,发人深省。诸如他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与分析,以及对不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都有个人的见解。由此而认识 20 世纪的历史。如此等等,至今仍是国际学者热心关注的话题。这虽是一家之言,却有相当代表性。从其作品还可看出,作者更像哲学家和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中国与法国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自然两国知识分子经历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共性可言。在 20 世纪后半叶,起码有两处共同点值得深思:中国发生十年浩劫,众多知识分子深受其害之后转为对政治的疏离,而法国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产生哲学的非政治化,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也产生对政治的疏离;90 年代后,国际形势剧变,所谓后冷战时期,各国知识分子都开始沉思,有了新觉醒。近读季羡林先生谈对胡适看法的文章,从他的《为胡适说几句话》的短文到他《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思考,说明季先生对胡适以及对自己的认识都有一个思想上的飞跃,一方面指出胡适是在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的怪圈中度过一生,“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对胡适作出了符合历史的表述;另一方面则讲述了自己在大

陆上下 50 年的状况,曾“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从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原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此话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送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而到了望九之年,季老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能站到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50 年岁月,往事如烟,想到自己的年龄,并无颓唐,却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季老简短一席话,却勾勒出了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及其心灵轨迹。而青年作家张平继《法撼汾西》、《天网》、《抉择》之后,最近又奉献一部反腐力作《十面埋伏》。他在后记中表白,以写大众化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为己任,“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他之所以能保持着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感冲动,这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他说:“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我,和大家一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自己的祖国能更加强大、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繁荣。所以要让我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那几乎等于让我放弃生命一样不可能。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对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的关注。现代政治是自由和民主的产物。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政治的冷漠,也就是对思想自由和科学民主的冷漠。”他还表示“面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民的艰苦卓绝;面对着泥沙俱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责任,其次才可能是别的什么……”,这就是我国一位青年作家正在走的“积极介入”的道路和心态。值此

世纪之交,时代呼吁我国也应有一部能表现中国特色的关于知识分子历史的著作,既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与评价知识分子,也利于知识分子正确认识与评价自己。无疑,那将会直接有助于科技兴国,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为此,《自由的冒险历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的视窗,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至于作者在书中表述的对本世纪历史文化事件、对某些著名人物、对重要政治或哲学概念(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制度、左派、右派,等等)的分析与论述,其观点往往是与众不同的,甚或是带有西方某种成见的,我国读者自应有分析地对待,有批判地扬弃。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格拉塞出版社的 Marie-Hélène d'Ovidio女士热心提供了有关作者及媒体对其作品反应的资料,也要感谢广州师范学院哲学教授于奇智博士提供的相关资料,还要感谢作者贝尔纳-亨利·雷威先生热心解答了翻译中的几处难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本译著难以面世。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张 放

1999年9月,北京

原 序

在5年的时间里，怀着犹豫与信念，我酝酿了这项计划：以个人的观点讲述法国知识分子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历史。

我进行了调查与探索，追寻一切可能的文献资料以及未曾面世或稀有罕见的形象。因为首先是为了拍摄一部电影，我跑遍了——我们跑遍了——欧洲电影资料馆，以便找到纪德在柏林或阿拉贡在列宁格勒的某张照片；初期超现实主义的某张底片或人们原以为丢失了的某个软片片断，其中有年轻的德里约·拉罗歇尔还十分活跃的场面。

我访问了所有的活着的人，那些事件的幸存者。我不知疲倦地，不惜冒犯他们的耐心，激怒他们的记忆，催促他们讲述、重复、澄清、再讲述。安德烈·马尔罗在西班牙时可能是什么样的形象？约赛特·克罗蒂丝在游击队里又是什么样子？艾吕雅、邦雅曼·佩莱在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是怎样的表现？高克托的最后遗言是什么？阿尔杜塞的最后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当巴塔伊和布勒东时而擦肩而过，又时而面面相觑，以各自影响相左，这一切是怎样实际发生的？全部的细节，总是全部的细节。很快，在这类活动中，是各种细节突显其意义。在这5年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惊奇地想到一个人的一生所能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堆细节而已。

我旅行过,旅行过许许多多的地方。我沿着布拉兹雅克或克勒维尔的足迹去过柏林,追踪阿拉贡和尼赞去过莫斯科,因为加缪去了阿尔及尔。在北京,我未能拍片,但我重读了《反回忆录》^①和《认识东方》^②。总之,这是在空间与时间里,在头脑与书本里进行的一种长途跋涉。在跋涉途中,我领悟到我所预感到的和我想像到的,在我之前曾体会过这类经验的人们所知道的一切:不管这样的漫步如何令人惬意,不管这些可见的美妙修辞、笔墨文章如何令人眼花缭乱,对一位作家而言,却总留有一种未及完成的感觉,只能通过写一本书才能消除这种不完美感。

因此,首先可以把本书当作对一种工作留下的遗憾汇编来读,因为这种工作由其性质决定就不可能完全满足精确、分寸与知识的全部要求。诸如:巴莱斯的后世影响,他留下了无可计数的作品;阿尔杜塞的第一次死亡;德里约与马尔罗、萨特与加缪错过的最后一次约会,等等。怎能错过错过的约会拍成电影呢?怎能在屏幕上显现第一次死亡或某种对后世的影响呢?原来,我把本书构想成犹如一系列连续停顿的形象和面孔,这样的构架如同给在附录中可看到的电影说明配以同步的视觉形象——电影说明中不时标明着每次参照我的相关篇章次序的注码。一方面是影片的简捷,另一方面是书的繁琐。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图像剪辑,另一方面是文字的润色。

也可以(尤其应如此)将本书当作文本来读,这个文本按其种类的逻辑和文字的功能必然自有其节奏、根源、必然性及相互衔接的关系,并且很快脱离其开始的载体。另一种行程。另一种表现。这种叙述的一部分是为了回应前者,到最后却服从于一种单独的逻辑。就像是——这对我而言绝非是最小的惊奇——知识分子的编年史根据其汇编的要求,其特点就在于对最得到公认的不同版

① 安德烈·马尔罗作品名。——译者注

② 同上。

本文字进行纠正,甚或是辟谣。就像是在最后,在结束这双重声音(书和电影)的叙述时,我不得不放弃想知道究竟是哪个声音发挥了启发、主导的作用,抑或是相反,只是重复了另一个声音。

因为最后,我希望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如果这冒犯“客观”历史的神学家们,那就对不起了——来读本书,即围绕我自己的信念游荡,通过联想他人,穿越20世纪,勾勒出造就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家族谱系,哪怕是不可告人的。此计颇为奏效。从波德莱尔到马尔罗或鲍尔治,人们忽略了那些不善于借助于在其周围召集“隐形宗族”而出名的作家们,这个“隐形宗族”是由或真或假的同代人组成,他们声称:正是这些人形成了他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家族。至于我自己,怀着应有的谦卑,我不了解其他的坦露真情和招认交待的方式。如果我写出了本书,这是因为我从各个方面看,它都像是我这样年龄一代人的书。

最后,请允许我补充说,这些“冒险”始于几年前人们觉察到一个世界行将崩溃之时,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结束于新的时代从各处,并在混乱中预示着即将到来之际。从共产主义的没落到伊斯兰的觉醒。从一种原教旨主义到另一种别的东西。一部历史在结束,另一部历史在开始。这些年里,当我在阿拉贡和左拉、艾吕雅和高克托的阴影下从事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未能摆脱这个念头:这个漫长岁月的事件、这些争论、这些无谓或流血的战争,有多少人的命运为之投入和失落,它们既离我们非常遥远,也与我们非常之接近。

我们是否已经到了理应将昔日的狂热看作等同于某种过时精神见证的时候了?也许有一部分是如此,因为能够总结一段历史的简单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是这段历史终结的证明。但是,对于余下部分,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思想的生命也有其特长:它能坚持不懈地重复再重复其主题、顽念、力量对比、冲动。和平与战争。热忱与疲惫。恐怖。提心吊胆与附庸听命。经过考虑,我很高兴选择此时此刻与志趣相投者分享这部法兰西

记忆与激情的集成。朋友也好,敌人也好,我们都受控于这相同的遗产。谁将能承担这遗产呢?谁将能从此遗产中得以解脱呢?

贝尔纳-亨利·雷威

1991年1月